



新观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十四)

战争文学:讲述与可能

□ 煥 强

我们的战争文学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与追问,比如对理想、意义、价值和内心的更本质、更透彻追问。

文学确实是将强光打在个人的身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截断他和社会、他者之间的丰富联系。我们的战争反思匮乏一个“将人类当做整体打量”的阔大情怀,匮乏终极之问。

文学难入高格。之后我们的文学有了相应的丰富和改变,在英雄塑造上,莫言的《红高粱》无疑具有强烈的开创意味,在颇具传奇色彩的叙事中他开始注意到“英雄”身上的多重混杂,那种从“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土壤中生长起的混合体。李亚的《流芳记》中,经历者的行径遭遇着反复的夸大,以至他自身都难以从中认出自己。刘建东的《一座塔》,传说中的龙队长与现实中的龙队长根本判若两人,而众人则更愿意相信传说中被神化了的英雄……在对战争文学的反省书写中,英雄的塑造确有了某种丰富,越来越有“百花齐放”的性质,但和那些更为阔大的经典比较,还是应该更丰富些、更复杂些、更独特些、更有普遍性些。在有限的小说阅读中,我注意到诸多的英雄多来自乡村,有某种草莽气,这多少造成我们的抗战故事是单向而流,那种全民民族的整体性似乎难以体现。有时候,在英雄塑造的过程中,我们让“民族性”成为先验的挡剑牌,让人侵的敌人垄断一切恶行,英雄只需要义无反顾就是了,只需要斗智斗勇消灭敌人就是了——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始终存在着,它既无法提升我们的智力水准也无法提升我们的认知水准。我们多见的是行动的个人而不是思考的个人,在向内而深的挖掘上,我们的写作还远远不够。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著名的《百年孤独》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无疑是个“英雄”,让我们先抛弃他将金鱼融化成金子然后再做成金鱼的故事,回味一段他和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的对话:“告诉我,老兄:你打仗是为了什么?”“还能为了什么,老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回答,“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啊。”“你知道为了什么,算是福,”他(奥雷良诺·布恩迪亚)答道,“我呢,现在刚发现我打仗是为了自尊。”“这可不好。”这段有意味的对话包含复杂,两个人的思考也不在同一层面上,奥雷良诺·布恩迪亚所要追问的是更为本质的东西,我们的战争文学应该出现类似的思考与追问,对理想、意义、价值和内心更本质更透彻的追问——毕竟在战争这一极端化的情境中,人可能更靠近“终极问题”。

我们需要怎样的反思?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用最为特别、生动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有魅力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让我们思忖,让我们停下来追问:一定要如此,非如此不可?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对小说的理解不应止于看故事,它会从一个侧面让我们对自己、他者和世界的理解获得丰富。我看看小说中思想的力量。对于这场人类灾难,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反法西斯战争,作为经历者,君特·格拉斯一生的写作几乎都与这场战争相关,“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埋头在历史的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我的世纪》中译本前言)。他注视的是:纳粹利用了一战失败后德国人心理上的“耻辱印迹”,将它重新撕裂并培养仇恨感,利用诸如“纪念碑”、“英雄”、“解放”等大词小用,使得德国民族进入到“信”和对领袖的崇拜中;“对称”是演讲台的风格,也是一切纳粹建筑的核心风格;他将刻板的庄重注入其中,强调着令人晕眩的严肃;他注视的是纳粹文化中“恻隐之心的自我销毁”,从众的心理和仪式的狂欢让人们变得麻木进而而不仁。格拉斯还从不同侧面让我们见识纳粹者高声宣传的“蛊惑之处”,譬如对希特勒的元首崇拜、纳粹集体的强烈荣誉、责任感的召唤、集体生活的温暖感和活力感、对于集体“纯洁性”的维护……在《蟹行》《狗年月》中,君特·格拉斯的目光注视到的是“纳粹”之后:战争的结束并没能让法西斯意识随之消弥,它隐藏了下来并有了诱惑的多面性,在后来人的身上又一次次出现并造成着可怕可怕的后果。写作中的君特·格拉斯专注于问题和问题的核心,通过对一个个“个人”的考察来完成对受害、沉默和历史的象征性追问。没错,在德国、在日本,法西斯不是突然形成并突然被接受,它是文化基因的一部

■ 编者的话

相对于70多年前那场场面宏阔、灾难深重而影响长远的抗日战争来说,中国的战争文学似乎至今也并未产生一部可以与之相称的史诗之作。

在世界范围中,不乏优秀的战争文学、反战文学。这篇文章将中国的战争文学放在整个世界文学的谱系中进行考察,从“我们需要怎样的英雄?”“我们需要怎样的反思?”“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书写’”三个层面入手,深刻呈现了目前中国战争文学的缺陷和不足。正如作者所说,“正视不足,才可期待更伟大的作品”,经由这一反思,作者期待“影响世界文学进程的‘经典’早日出现”。

分,是从古老的潘多拉盒子里被放出的,我们对它的警惕不应止于情绪。

在我看来,君特·格拉斯的写作可作为某种标式的参照,相对而言,作为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的中国,我们的写作能达到的高度还远远不够。我们匮乏对法西斯的反思,匮乏对“何以至此”的反思,同时也匮乏如何制止“已有之事,后必再有”的方法——至少,我们应以我们的方式提出警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小说家、批评家给予文学的任务是反思人性的复杂性,这当然没有错,但它并不是终点,到此为止依然显现着某种浅薄。我们应当注意到更为复杂广阔的影响……文学确实是将强光打在个人的身上,然而并不意味着截断他和社会、他者之间的丰富联系。与英雄塑造中的问题大致相同,我们的战争反思也匮乏一个“将人类当做整体打量”的阔大情怀,匮乏终极之问。

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书写”?我们对文学的现实性有着具体而普遍的要求,然而对“如何达到”理想的现实书写,我们做得还是远远不够。小说家要创造,“把小说等同于现实,既是对小说的侮辱也是对现实的侮辱”(纳博科夫)——然而小说的现实感永远无法忽略,对它的漠视也就是对文学的漠视。在“现实书写”中,我认为多数作品存在的问题是:案头工作做得不够不细,以致于在使用材料和“复原场景”的时候捉襟见肘;在虚构真实的时候忽略了“全部活生生的生活体验”,依靠某些理念和道德政治正确搭建起的作品自然造成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和隔膜;在故事讲述上用力过多,急于讨好读者的心态影响到了对现实复杂性的注意;对真实的恐惧——许多现实发生一旦进入小说我们便无力呈现,只好择取相对易理解的、可顺利操作的、不冒险的,另外的部分只得剔除。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样式?对于战争文学,书写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文学,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都相对单一,那种文体上的创造感远远不够,属于作家的独特标识也未能较好地确立。



文学批评文章之所以给人“过剩”之感,因为同质化、平庸化的东西太多,现在的许多学术论文也可叫“翻论”,在同一研究对象身上不停地“推陈出新”,其可挖掘性、可研究性、可创新性就值得怀疑。这种复制性威胁着每一个具有独立批评话语能力和艺术个性的批评家。无效的话语繁殖淹没了有效的意义阐发,文学批评的“不足”之症反过来侵蚀了文学本身,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



雷达观潮

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

□ 雷 达

当今的文学创作从数量上看是繁荣的,当今的文学批评从数量上看也很繁荣。如果注意一下每个时段集中评论的话题和作品,我们又可能会产生一种话语自我繁殖和理论过剩的感觉;而富于主体精神和独特见解的、有个性风采的、敢“刺烂苹果”风格犀利的、有言语文感的评论却很少见。这“过剩”与“不足”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文学批评文章之所以给人“过剩”之感,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同质化、平庸化的东西太多,它们的角度、思路、思想资源、评价标准、话语风格都大体一样,既提不出什么尖锐的问题,也不可能作出什么意外的评价。价值立场也许都很“正确”,但价值立场不能代替文学批评本身,它们的审美精神是狭窄的和单一的,没有显示出审美的丰富性、多样性,更谈不上观念和方法的创新。有人说,纸媒的文章编辑和审阅比较严格,显得规范、严谨,温吞水,面目相近;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的文章,发表渠道便捷,反而显得活泼、生动、接地气,它们的芜杂则是另一个问题。这话有一定道理。二是,有些论题相对固化,隔几年就会转圈儿似的重新讨论一回,例如振兴文艺评论的问题、市场化与社会效益的问题、深入生活的问题、城市文学问题、底层叙述问题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无疑是重要的,值得反复讨论,但这样的讨论又往往是平面推进,原地兜圈子,以至讨论者也不免疲惫。三是,研究队伍的庞大与研究对象的单薄之间的不平衡。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队伍可谓庞大,高校教师、学生,再加上文联、作协和各科研机构,人数可想而知。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一线作家”身上,像莫言、贾平凹、王蒙或者张爱玲甚至胡兰成,都变成了“唐僧肉”,研究他们的论文加起来,恐怕比他们本人的著作要长出十倍百倍。影视界有个词儿叫“翻拍”,现在的许多文学论文也可叫“翻论”,在同一种研究对象上不停地“推陈出新”,其可研究性、可创新性就值得怀疑了。

此外,功利性和非审美的批评是当今文学批评“过剩”的又一重要症结。今天的批评者很难将批评行为当作一种单纯的审美过程、一门学问、一种鉴赏艺术,虽然他们也深知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具有独立的品格,有一个神圣的空间;但其介入文本的方式却常常是功利性的、策略性的。从本质来看,有效的文学批评是一种表达和阐述的精神活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不可小觑的引领力,其功能在于对文学对象的介入,简言之,就是通过批评让读者亲近文学,而不是成为文学的陌路人,让读者乐于体悟自己也乐于了解世界。但是,由于文学批评的实用化、工具化、商业化及习惯性伦理,有效的批评难以应对“文本之外”的现实,而沉浸于“文本内”有见地的声音往往会被非文本的意义阐释或过度阐释所淹没,文本被肢解,文学批评的功能被异化,文学批评的审美空间受到挤压。文学评论如何搞已不单是发挥个人才能的事,批评家在今天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语场”,他们在人情、资本、前文本和习惯性评价伦理的链条上的缩手与尴尬也就在所难免。也许情况比这还要复杂。我们需要的是读者、批评家对作品介入的单纯和热情,批评者与作品的交流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性交往”,而非“策略性选择”;一些“粗暴”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仍是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所说的“寻美的批评”或“求疵的批评”,他们大体上也还是面对作品。

在这个功利化审美的“话语场”中,最难得一见的是不同立场者的“和而不同”的互动。当批评被“科学化”后,当代文学评论也被纳入一种史料式的研究规范。这种研究自有其理论高深之处,但是大量据性的批评远离了性情与温度,不再关涉经验与经验之间的可交流性,尤其不善解读诸如悲欢离合、爱恨交集、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人生的复杂情感状态。在批评和研究最为密集、人数最为庞大的高校,文学批评与作品、人生的脱节现象令人担忧。一方面,规范的批评方式被认为更“科学”、更“学术”,也更容易得到高校评价体系的认可,而个人化色彩较浓的批评文章很难算作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其文学的审美判断在多数情况下显得并不鲜活,充斥于其中的多是一种没有热度的呆板的“冷批评”。由于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功利化制度的犁铧掘开了鸿沟,经典研究与跟踪批评也都不能很好地对话,译者自评,读者自读,热者自热,冷者自冷,互不相涉、漠不相关;一些重要的、先锋性的创作得不到及时有力的评论,一些带有典型性的创作难题得不到及时的正视,而一些无关宏旨的话题却铺天盖地。很多文学研究者复制着似曾相识的论著,炮制着批量的论文,这种“过剩”的利益生产”最终淹没了那些有个性风采的美文批评。这种复制性也具有不可阻挡性,它威胁着每一个具有独立批评话语能力和艺术个性的批评家,也就是说,无效的话语繁殖淹没了有效的意义阐发,文学批评的“不足”之症反过来侵蚀了文学本身,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

当然,当下批评的“过剩”与“不足”远不止这些。健康有力的文学批评的出现需要一个个质地坚实见解独具的文本,更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语境,而批评家自当具备一种在公正立场“说话”、直面作品的批评伦理。倘若能进一步改善历史文化语境,能斩断作品与它后面种种非文学因素的联系,大量没有意义的过剩与复制自然就会减少,一种深入到作品内部的有效批评和探究文本奥秘的“美文批评”也才有可能更多地出现。

资助研究课题申报启动

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会 为深化文化管理理论研究,为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发挥文化管理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积极作用,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会日前发出通知,启动2015年度协会资助研究课题的申报工作。本年度发布的4项研究选题,分别是:中国管理理论设计研究、中国管理理论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路径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实现“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研究。申请者可围绕以上选题方向,自行确定具体的研究题目。据介绍,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会和各分支(代表)机构及单位会员,中国大陆的自然人及法人机构,均可参加申报,但每人(机构)只能申报一个课题,课题最终研究成果为书面研究报告。申报成功的课题,将择优结集出版。具体研究课题、申报条件及注意事项、申报要求、经费资助、受理时间等,可登陆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会官方网站查阅。(欣 闻)

冯娜成为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

本报讯 近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入校仪式”在京举行。冯娜是云南丽江人,白族,毕业并任职于中山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首位“85后”驻校女诗人,冯娜的诗歌创作成果是丰硕和优秀的,著有《云上的夜晚》《寻鹤》《彼有野鹿》《一个季节的西藏》等诗文集,并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先后在《诗刊》《中国诗歌》《天涯》《星星》《山花》《广州文艺》《中西诗歌》等杂志发表多篇诗作,荣获“2014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二届奔

腾诗人奖”等奖项。本次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敬教授主持。会议伊始,首都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及研究生进行了诗歌朗诵表演。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主任赵敬刚、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杨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福春,诗人林珂、邵瑾、安琪、北塔、谷禾等人发言,与会者纷纷对冯娜的驻校生活寄予期望和祝福。会议最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娅总结发言,并向在座的各界朋友对首师大驻校诗人制度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郭建超)

孙晋强摄影作品展在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开幕

本报讯 “我的家园,我的朋友——孙晋强摄影作品展”近日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开幕。中外嘉宾数百人参加揭幕仪式。摄影展的作品从形似金色麦浪的中国馆入口处两侧开始,向来宾们诉说着陕西悠久灿烂的非物质文明成就。展览作品从自然、生灵、文化三个方面,充分展示了陕西特殊的地理环境、鲜明的物候差异、多元的文化特质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孙晋强表示,世博会是展示文明成果、倡导和平与发展、展望人类未来的重要舞台。中

国馆举办的各类展演活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对未来发展的责任和期望。摄影展期间,还举办了“米兰世博会意大利—中国摄影艺术家对话会”。“中国摄影师眼中的南极”和“意大利摄影师眼中的南极”相映成趣,让与会者领略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摄影家拍摄同一题材所呈现的不同的视觉体验。大家认为,这是中意两国摄影艺术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两国艺术家将以此为契机展开更多对话交流。

专家研讨白荣敏《福鼎史话》

本报讯(记者 王冕) 近日,由《海外文摘》杂志社、《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社、福建福鼎市政协、福鼎市委宣传统战部主办的白荣敏《福鼎史话》研讨会在京举行。韩静霆、王彬、蒋建伟等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福鼎史话》是福鼎籍散文作家白荣敏创作的一部文化随笔集,书中收录的99篇文章对福鼎的历史文化、自然地理、风俗民情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景式深入介绍。与会者认为,该书内容丰富,文笔洒脱,具有中国文人气度,不仅立足于详实的史料和人文知识,而且以散文的创作手法谋篇布局,对于传播福鼎传统文化、推动闽东地区人文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作者潜心创作,找寻福鼎人的历史故事和足迹,倾听祖先的呼吸和人生悲喜,体现了对家乡的深挚眷恋和热爱之情。

王勉思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离休干部王勉思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9月23日下午3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王勉思,原名陶景和,1923年8月24日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省绍兴县。1944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5月入党。先后在晋察冀边区、北京工人出版社、河北省文联、湖南省文联、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1982年1月任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1985年4月离休,2015年9月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主要作品有诗歌《无题》、回忆录《风雨故人情》等。